



二十、欧阳竞无——开近代佛学研究之新风



欧阳竞无像

如果说杨仁山为近代佛学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，那么，其弟子欧阳竞无则为近代佛学研究开创了一代新风，使佛学研究有了近代学术的色彩。

欧阳竞无（1871—1943年），名渐，江西宜黄人，人称“宜黄大师”。其父曾任清农部尚书。欧阳自幼习儒学，1890年考中秀才，后进南昌“经训书院”攻读传统典籍，兼修天文、数

学。然而，他的生活是不幸的：6岁丧父，又是庶出，自幼受尽歧视；生母长年患病，他自己也身体羸弱，几度大病濒死。因此，他在致力于功名的同时，一直对“生死大事”耿耿于怀。于是，他开始翻阅佛教经典。1904年，他第一次到南京谒见杨仁山，从此拜杨为师学习佛学。1906年，他因母亲病故而悲痛欲绝，把主要精力用于佛学。第二年，他第二次赴南京跟随杨仁山漫游。在他39岁那年，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了他的生命。经过多次生死痛苦的煎熬，欧阳大彻大悟，决定为佛法献身。于是，1910年他第三次到南京谒见杨仁山，跟随其左右研究佛学。翌年，杨仁山病逝，欧阳承其遗志经营金陵刻经处。

欧阳不仅因“病魔”、“生死不了之事”的痛苦体验而由儒转佛，而且随着这种体验的升华不断加深对佛学的理解：他因女儿死“痛彻于心脾”而钻研《瑜伽》；因子、友死而习《般若》；因姐、友死而治《智论》、《涅槃》。所以，欧阳对佛学的研究深深地渗透着个人的亲身体悟。

当然，欧阳对于佛学研究的杰出贡献，主要是他将佛学研究朝着近代学术研究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首先，欧阳把佛学研究人才的培养纳入学校教育。1918年，欧阳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设支那内学院筹备处（因古印度称中国为“支那”，佛教自称为“内学”，故名）。经过四年的奔波张罗，1922年7月支那内学院在南京公园路正式成立，欧阳自任院长。由此开创了用近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培养佛学研究人才的途径。在主持支那内学院院务期间，欧阳一方面加强院务管理，亲自撰写了近万字的《内院训释》，把“师、悲、



教、戒”作为“院训”，并逐一进行阐释，以使学生明确自己的职责；另一方面，积极开展学术活动，主持间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，编辑《内学》杂志，并在1922年秋公开讲学，听者甚众，吕澂、汤用彤、梁启超、梁漱溟、黄树因等这些后来佛学研究成绩卓著者，都入室执弟子礼。为了使佛学教育有较好的固定的教材，欧阳编辑《藏要》三辑，共50余种，300多卷。《藏要》在佛经校勘方面也表现出注重与原梵文本对勘的新方法。

其次，受到近代科学方法的影响，欧阳竟无非常重视佛学的研究方法，为此他曾专门撰写了《今日佛法研究》、《谈内学的研究》等论文，提出了“内学为结论后之研究，外学则研究而不得结论者”的观点。即认为佛学研究和其他学问（外学）研究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佛学研究是结论在先，论证在后；佛教的一切教义都是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，研究者的任务，无非是用种种解析方法，去证明这一结论的真理性。欧阳所倡导的这种研究方法，今天看来似乎很奇怪，实际上这种方法既是佛教贯用的解经方法，也是中国儒学传统的注经方法，欧阳只不过是“用结论后之研究”这样更为准确的语言加以概括而已。并且这种方法从总体上看，也是不正确的，是一种独断论方法。但是，也必须看到，欧阳在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，却提出了一些卓见。比如，他曾提出，在佛学研究上有四忌：一忌望文生义，二忌裂古刻新，三忌蛮强会违，四忌模糊真伪。他还曾提出，佛学研究要注意两件事：一是“须明递嬗之理”，即弄清佛教在释迦牟尼创立之后，是不断发展的过程，其间经历了“二十部小乘兴净”、“龙树破小”、“无著详大”等过程；传到中国后，又经“荟萃”，形成“各家学说，

皆得会通”的局面。二是“须知正期之事”，即在“整理旧有”时要“简别真别”、“考订散乱”；在“发展新资（料）”时，要“借助藏文”和“广采时贤论”。他的这些观点，直到今天，对我们研究文化史，特别是佛教史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再次，欧阳竞无表现出将佛教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加以分析的近代意识。他虽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但与杨仁山的信仰主义有所不同，他除了以自身遭遇体悟佛学真谛之外，偏重于对佛教作学理上的研究。因而其名言是：“佛法非宗教非哲学”。他说：“宗教哲学二字，原系西洋名词，译过中国来，勉强比附在佛法上面，但彼二者（宗教、哲学），意义既各殊，范围又极隘，如何能包含得此最广大的佛法。正名定辞，所以宗教、哲学二名都用不着，佛法就是佛法，佛法就称佛法”，“佛法非宗教非哲学”。

欧阳还进一步具体分析了“佛法非宗教非哲学”的原因。他认为“佛法非宗教”，是因为佛法与其他宗教有四个方面的不同：“第一，凡宗教皆崇仰一神或多神及其开创彼教之教主，此之神与教主号为神圣不可侵犯，而有无上权威能主宰赏罚一切人物，人但当依赖他。而佛法则否。”“第二，凡一切宗教必有其所守之圣经，此之圣经但当信任不许讨论，一以自固其教义，一以把持人之信心。而在佛法则又异此。”“三者，凡一宗教家，必有其必守之信条与必守之戒约，信条、戒约即其立教之根本，此而若犯，其教乃不成。其在佛法则又异此。”“四者，凡宗教家类必有其宗教式之信仰。宗教式之信仰为何？纯粹感情的服从，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判者是也。佛法异此？”因此，他认为宗教与佛法，“二者之辨皎若白黑”，



宗教是不能与佛法相提并论的。

至于“佛法”为何“非哲学”，欧阳认为，哲学与佛法在内容上有三个方面是对立的。“第一，哲学家唯一之要求在求真理，所谓真理者，执定必有一个甚么东西为一切事物之究竟本质，及一切事物之所从来者是也。”“二者，哲学之所探讨即知识问题，所谓知识之起源，知识之效力，知识本质，认识论中种种主张皆不出计度分别。佛法则不然。”“三者，哲学家之所探讨为对于宇宙之说明，在昔则有唯物唯心一元二元论，后复有原子电子论，在今科学进步相对论生，始知宇宙非实物，不但昔之玄学家之唯心论、一元论无存在之理由，即物质存在论亦复难以成立。”因此佛法非哲学。

欧阳竟无“佛法非宗教非哲学”的观点是不符合佛教实际的，因为事实上佛教既是一种宗教，也有它自己的哲学。但是他在论证这一观点的过程中，或多或少地看到了佛法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和哲学，与其他宗教和哲学是有区别的；并且比较深刻地揭露和批评了其他宗教的神学本质和虚伪性，也揭露和批评了哲学史上的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。表露了一些无神论的思想，从而使他对佛教的虔信少了迷信、盲从，多了理智的分析。

第四，欧阳竟无开创了近代佛学注重研究法相唯识学的学术方向。法相唯识学在近代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受到冷落。近代佛学的复兴，在某种意义上是唯识学的复兴。这在杨仁山那里已初露端倪，欧阳则将其端倪明朗化了。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：“法相、唯识非一”，反对了以往视法相、唯识为一体的看法。他以印度瑜伽行派发展的历史为线索，认为先立法相，后创唯识。并且认为，从典籍上看，《集论》主要

详述法相，而《摄大乘论》则重在阐扬唯识。因此，法相、唯识是两宗，它们各有所源，各有所本。这个观点在当时并没有为大多数佛教学者所接受，后来赞成的也不很多。直至现在，人们普遍认为法相和唯识是一门学问，就重视分析方法而言，称之为法相；就其主张万法唯识而言，称之为唯识。因此，欧阳的这个观点对后世的影响不大。但重要的是他注重唯识学研究的学术方向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。

欧阳竞无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。1943年2月23日，欧阳竞无因肺病逝于四川省江津内院。他的著作多在搬迁中散失，晚年手订所存者有《竞无内外学》，共26种，30余卷，由蜀院刊印。